

“第一届抗战区域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东华 匡 成

2017年12月9—10日，“第一届抗战区域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此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单位的27位学者递交了会议论文，涉及抗战史研究的多个领域。

一、根据地与抗战区域史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日趋成熟，有关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日常生活、灾荒救济、公粮征集、公安保卫等问题，在本次会议上都有涉及。李常宝（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不能饿死人：1943年中共太行抗日根据地灾荒赈济之逻辑分析》指出，1941年至1942年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持久的旱灾使得根据地的建设难上加难。中共太行抗日根据地动员一切力量赈灾度荒，形成“非真心赈灾无以生存”的内在逻辑，即救灾既是中共内生性政治理念之驱使，又是外源性生存空间压力所致，是特定时空之下的时代必然。李可（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论抗战时期太岳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的初步实践》指出，太岳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抗战初期创建起来的，其战略地位极为突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推进抗战进程及革命发展，中共始终立足于基层且高度重视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伴随着相关工作的开展，使其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社会治理以及革命历程中的功效不断显现。同时，在公安保卫工作实践探索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共亦采取措施进行修补与防范，使公安保卫工作得以拓展与进步，也为中共实力的增长贡献了力量。

根据地的公粮政策和减息政策在此次研讨会上有三篇论文讨论。孙启正（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不怨多出，只怨不平”：山东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问题探析》认为，救国公粮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虽然面临累进率、累进速度难以平衡等困境，但山东革命根据地制定和修订了十数种公粮负担办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征粮实践，是中共“统一”民众负担和追求“公平负担”的一次重要尝试，为统一累进税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张晓玲（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现代化视角下的公粮收支研究（1940—1948）——以晋绥边区为例》一文认为，公粮收支在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财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战争提供了物资保证，而且增强了中共在边区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锻炼了中共在边区的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了民众对中共的信任。吴云峰（黄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减息政策与借贷需求——以革命与乡村社会关系为视角的研究》以华中地区为研究范围，探究减租减息政策与借贷需求间的关系。吴文指出由于土地分配的不合理、副业的落后及日本的经济掠夺使高利贷难以禁绝，为此根据地调

整了减息政策,允许新债自由议定,举办合作社,发放农贷,倡导贫富互助,调解债务纠纷,发展生产,活跃经济,从而促进了农村借贷关系的健康发展。

根据地的军队、武器和斗争问题,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热点。张文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红军改编八路军再探》认为由于中苏关系改善和日本侵华加剧,中共逐渐趋于与国民党的“地位对等”,从而使一场妥协与不妥协之间的较量发生转变,蒋介石只能接受红军改编。红军改编八路军解决了中共及其武装的生存危机和合法性,实现了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开创了中国抗日新局面。刘世超(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不屈的抗争:中共山东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及演变》一文,对山东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情况进行了考察。刘文指出,在日军侵入山东之际,民枪是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及抗日武装的原始资本;随着中共山东抗日武装逐渐走向正规化,转而依靠作战缴获、瓦解敌军和收缴国民党军“战利品”来满足部队对武器的需求;此外,中共领导的山东军工建设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宋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战场的革命:抗战时期冀中区的交通斗争》一文提出,抗战时期冀中区的交通斗争主要包括拆城、挖沟、破路、拆电线、河流斗争等形式,其过程中,群众、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中共之间呈现出了复杂而多变的互动关系,为了解中共持久抗战提供了具体例证。

此外,孙健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众星拱辰——战时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小延安”论探》一文讨论了抗战时期及战后一个有趣的话题——“小延安”问题。文章认为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有许多地方被人民群众赞誉为“小延安”,因为它们在根据地内部发挥着如同首府延安一样的核心辐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不仅依赖于其政权中心、干训基地和战略后方的客观要素,更重要的在于它们战略职能的主观运行。

二、抗战区域史中的个体与群体研究

近年来,抗战人物研究比较火热。一方面,随着蒋介石日记等资料的开放,“大人物”的抗战成为学者关注较多的课题;另一方面,地方档案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小人物”“普通人”和“群体”研究也不断出现。本次会议因应抗战人物研究的这种变化,对从普通人、中层精英到大人物的“个体”研究与从基层县长、公教人员到政学界等“群体”研究方面,都做了新的探讨。

在“小人物”研究方面,陈明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战时青年政工人员的心路历程:以〈鼎臣日记〉为例》一文,以馆藏于浙江丽水的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的19册《鼎臣日记》为中心,介绍了青年王莱1939年报考战时工作干部被录取后,辗转抵达西安后的训练、工作和日常生活点滴,以及对各种遭遇的所思所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了解抗战时期青年心态的曲径小道。陈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左右之争与大学校政:陈立夫、徐诵明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整顿》一文以徐诵明为中心,讨论抗战初期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左右之争与政治博弈问题。陈文指出,徐诵明在左右间取得平衡的努力未能令陈立夫满意后,陈立夫直接介入法商学院,整顿校务。徐诵明和学院左翼师生奋力反对,双方博弈的结果,使得大批左翼教员被迫离职,徐诵明拔掉了陈立夫敲下的钉子,自己也被调离耕耘10余年的大学。在左右之争的大背景下,左翼师生要指点江山,右翼师生要保卫社稷,大学校政往往难以维继。

在“大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作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中的重要符号一直是学者关注较多的热点。郭子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在《国难中的“国父”:抗战时期国共孙中山纪念的多重互动》一文中认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各自形成了对孙中山的成熟表述和纪念方式,被赋予多重功能的孙中山纪念,背后是国共之间的互动与角力,更凸显了两党同中有异的政治逻辑。国民党将孙

视为战争动员的重要元素,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亦成为“拥蒋反汪”的宣传媒介,却在基层遭遇种种困境。中共则在重庆通过统战工作与地下党活动,利用孙中山进行自我宣传,为国民党制造合法性危机。

群体研究方面,本次会议有五篇论文涉及。郭川(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日常生活视域下的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一文认为,公教人员群体属于民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工薪阶层”,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对于国民政府的运作乃至存亡都至关重要。抗战时期,随着战局的变化和日常生活的恶化,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由量变到质变,并通过行动阶段性地呈现出来,日积月累的后果就是使公教人员由抗战初期对政府的拥护,到抗战后期与政府的疏离。虽然囿于民族大义,这种心态变化在战时得以隐忍,但已经悄然改变着公教人员的政治态度,并在抗战胜利之后最终爆发出来,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共内战的结果和中国历史的走向。马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从“同源纯汉”到“歌舞部族”:抗战前后广西政学界的民族表述与民族展示》一文聚焦于抗日战争前后广西政学界对苗、瑶、僮等族的民族认同问题,认为从“种类不一”到“同种同源”再到“纯汉”,不同表述的背后都受到抗战前后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随着抗战中后期文艺界团体南下桂林,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师生歌舞表演,又使得西南民族的歌谣舞蹈成为知识界眼中中国文化建构的一部分,此后唱歌跳舞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深入人心。张雅倩(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在《抗战前后大陆台胞返籍研究——以东北、冀热平津、上海、海南、广州、厦门为中心》一文中探讨了抗战前后台胞的返籍情况。战后初期大陆台胞在7.5—10万人之间,主要分布于东北、冀热平津、厦门等地。随着抗战胜利,面对生活状况不佳、身份认同困难、财产处置、汉奸处置等困境,在大陆台湾同乡会、岛内民众等民间力量的积极救援下,在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各省党部、“联总”、“行总”及15个分署、各市政府等官方力量的救助下,1946年底台胞基本返台。

江铁(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青团基层团务研究——以湖南三青团训练活动为例》,以湖南省市县的地方档案为中心,考察了湖南三青团的团员训练、干部训练、分队会议和南岳青年夏令营等团务训练,指出湖南三青团并非仅仅被定位为对青年进行组训的组织,自抗战中后期以后逐渐开始进行“反共防共”活动,同时也为自身“组党”“党团合并”等政治需要服务,三青团最终成为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民党县长与西安事变——以西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西安事变的起承转合既关联着高层也牵涉基层。县长作为关联各方的重要节点,作用不容低估。事变之前,县长的人事更迭已凸显着西北政局的急剧变化。事变期间,不仅县政措施及时跟进,县长的作为亦可圈可点。他们一方面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另一方面竭力营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氛围。更有一些县长全程参与,为西安事变的发展演变提供充分便利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多数县长虽延续着“官随人转”的政治逻辑,但国民党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也使得县长的思想倾向发生变化。地理上与中共接壤的国民党县长,在西安事变与中共统一战线的激荡和影响之下,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整体上看,日记中的个体生命经历及其家国情怀丰富而生动,而基层群体个案的研究虽然能够依赖地方档案做出一些新的探讨,但缺乏“生命与生气”。

三、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与交通

抗战时期的地方海关、通货膨胀与工业发展问题,在本次会议上有较深入的探讨。傅亮(苏州

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地方海关:以洛阳关为例(1942—1945)》一文考察了洛阳关的建立、职员的补充与更新、贸易与税收以及灾荒与海关职员待遇等,认为1942—1945年期间,洛阳关的贸易与关税在国统区海关中具有重要地位,界首分卡甚至成为沦陷区与国统区贸易之中心。即便如此,洛阳关仍然受到河南灾荒极大影响,灾荒期间,即便如海关职员,其日常生活也出现困顿甚至难以维持的现象。

贺水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论1937—1949年通货膨胀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一文认为通货膨胀不仅具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对于经营货币资产的银行也有资源再配置的作用。1937—1949年通货膨胀,不仅使中国的存款日益向国家银行集中,更使一流商业银行的存放款能力大幅度萎缩,商业银行沦为“工商业的总账房”。12年的通货膨胀,使商业银行对中国近代金融、经济的影响力日趋式微,最后至无足轻重的地步。

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雍兴实业公司与战时西北工业发展(1939—1945)》一文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银行配合国民政府的国防工业计划,向西部地区增设分行,扩展业务,雍兴公司便是其中一例。该公司是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兼营印刷、酒精、机械制造等多个产业的大型垄断性企业,既为战时西北工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加速了战后国营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全面吞噬。

曾崇碧(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财政中央化:抗战后期四川县级自治财政收入来源结构分析》一文考察了1941年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前后四川县级自治财政收入变迁,即原属县级自治财政收入的三项省税(田赋、契税、屠宰税)附加收入随正税收归中央,县级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自治税捐、公学产收入和特许费。且由于改订后中央划拨县市国税收入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弥补财政改制后留下的收入缺口,导致各县市收入锐减,县级自治财政更加依赖于整理收入及摊派来维持收支平衡。

抗战时期的交通、通讯是关乎普通人命运的大事。游海华(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区域的交通变迁》一文提出,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国统区所组成的中国东南区域,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战前该地区的现代公路、铁路与传统的水路、陆路已经联结成比较通达的交通网络。淞沪会战爆发后,进入战时体制的东南区域,应军事需要紧张开展修路、护路和毁路等工作;随着抗战局势变化,交通网络呈内缩趋势,腹地城市取代沿海口岸成为东南区域的交通中心;交通建设受军事因素影响大,同时对军事、国防、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等亦影响至深。黄鹏(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邮就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研究》一文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的创办过程、机制设置、功效演变及对抗日战争的作用问题,指出因军而兴、以军筹设、为军服务的军邮在协助作战、激励士气、安定民心、军地沟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个案研究正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次会议有四篇论文聚焦于此。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文化“宣抚”的真相:沦陷初期的杭州日华佛教会初探》一文以“杭州日华佛教会”为载体,认为杭州沦陷初期杭州日华佛教会创办“日语学校”、办理“难民救济”、改造“大乘佛法”等,都是日军杭州特务机关推行的文化“宣抚”手段,其目的在于消弭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抵抗思想;研究沦陷区“合作”或“协力”问题,应关注更为复杂的“当时场景”,从对方史料发现被遮蔽的“道德评判、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而非简单的扬弃。

杜恩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制造合作者”:以山东沦陷区省行政人员训练所建设人员讲习班为个案的考察》以“建设人员讲习班”为个案,认为学员大多有生活负担,生存是其加入伪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伪山东省公署在济南创设的建设人员讲习班具有系统的组织办法、招生简章、课程分配、讲授和考试方案、毕业任用方法,还有充足的经费来源,其目的是充实各级伪政权,巩固日伪统治。因此,行政人员训练所根本上是日本维持沦陷区秩序的工具。

汪效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掌理沦陷区工作:战地党政委员会(1939.3—1943.2)研究》一文,通过对战地党政委员会这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掌理沦陷区工作的党政军联合机构的考察,肯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但是认为这一组织的存在是具有双重作用的。它既有抗衡日本殖民统治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蓄谋反共,制造摩擦的消极作用。

魏坡(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以董毅〈北平日记〉为例》,通过对沦陷区青年董毅矛盾内心梳理,反映出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多种权力、利益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场域,在竞争与妥协中,民族主义的内容不断更新与再生,进而也影响了民众对不同政权的认同乃至战后的秩序重建。魏文认为对沦陷区民间社会民族主义的研究应当引入“日常生活史”视角,关注普通人惯常的经历和感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理解、叙述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虽然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拓宽了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利用了一批新史料,对抗战区域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仍然有可以提高之处。《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不少是有区域性的,但学术观点不能有区域性,抗战史研究也是如此。有些观点从某个区域来看是正确的,但从整体来看就未必。将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等不同区域进行内部比较、横向比较,重新整合资料,或许会有新的、高屋建瓴的发现和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认为抗战区域史契合新文化史视角下的全球史和区域史研究。因此,他强调无论是从域外看域内,还是从域内看域外,甚或域内域外融通,都要既突出区域的主体性,避免区域研究的碎片化,更要从长时段考察区域本身的运动、区域内人的处境与选择以及区域中自然、文化的变迁与互动,“做有灵魂的研究”。

[作者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匡成,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